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论毛泽东理论创新中的比较思维

周耀宏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2)

摘要: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做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比较分析的思维方法是毛泽东常用的考虑问题、作出决断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是为一般人所意想不到和难以置信的,这正反映了他独特的思维艺术魅力。毛泽东比较思维的基本方法包括阶级比较、国情比较、历史比较、敌我比较、正反比较等。毛泽东比较思维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研究毛泽东比较思维方法的特点及其规律,对我们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理论创新;比较思维;思维规律;思维特点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3)04-0022-04

On Mao Zedong's comparative thinking in hi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ZHOU Yao-hong

(Philosophy & Public Administration Faculty,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2,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applied Marxism in a creative way and made much great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The mode with which Mao Zedong considered things and gave judgements is incredible by average people. However, it just shows Mao's charm of this unique thinking art. His comparative thinking includes comparisons between classes, national conditions, histori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and comparison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enemies and so on. Mao's comparative thinking has its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hines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at we study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omparative thinking; laws of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inking

毛泽东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作出卓尔不群的决策和设计,成功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缔造了伟大的新中国。其中比较的思维分析方法是毛泽东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他习惯使用的重要方法。通过比较分析,使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一个个迎刃而解,为马列主义的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毛泽东理论创新中的比较思维方法的具体表现

(一)阶级比较法

通过阶级比较,解决了“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马列主义阶级分析和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创新和发展。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对比分析,分清了敌我

友。他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有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因此,“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革命的大旗,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1]对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通过比较分析,又把它区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点余钱剩下的”,“这种人胆子小,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取了中立态度,但是绝对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1]“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者”,“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1]对半无产阶级的分析,根据比较划分为五种,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对于无产阶级,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确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并进一步指出了它的两大特点。对其他的社会力量,毛泽东指出:“这一批人很能英勇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通过对以上各阶级阶层的对比分析,毛泽东最后得出了谁是敌我友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领导阶级。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1]通过这种阶级比较分析的方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进一步更为深刻地发展了阶级比较的方法。

(二)国情比较法

通过国情比较,毛泽东找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作出了创新和发展。

由于马列主义产生于欧洲,“它所提出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在中国就具有更大的特殊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在这里进行革命,势必会遇到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不曾遇到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2]因此,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任何国家的革命党,要正确领导本国革命,必须首先正确地认识本国国情,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也不例外。“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3]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几次右倾和“左”倾错误,其共同点就是错误地认识了中国国情。毛泽东通过对比分析,指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六大特征。通过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对比,指出了民主革命的方向。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人类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的新时代。”此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此后,“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3]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说明,墨守成规、照搬别国经验的思维模式是走不通的,各国国情不同,所要走的革命道路也不相同。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走的是发动工人武装起义,先占领城市,然后把革命推向农村的道路,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对外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对内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并且无产阶级政党也没有合法斗争的通道;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并且长期占据中心城市,革命的敌人凭借其武装力量,对人民进行独裁统治,而农村的统治力量则相对薄弱;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因此这些特点就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与俄国相反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三)历史比较法

历史比较法是毛泽东最常用的思维方法。通过历史比较分析,毛泽东找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对马列主义民主革命理论作出了创新和发展。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通过对1924~1927年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回顾,通过对五次反“围剿”的历史反思和比较,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正确作战原则和方法,并

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总结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1927年的革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进而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而且如果弄的不好,还可能失败”。^[1]“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1]

通过历史比较,毛泽东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还要在条件许可时继续向前发展,即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毛泽东通过深刻的历史比较分析,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只有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之间的联系,才能正确的领导中国革命”。^[3]通过历史比较,规划了未来发展的前景,并对二阶段作了比较区分,使人耳目一新,一目了然。毛泽东还指出,把二者“毕其功于一役”是空想,是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是极其有害的。^[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百年的中国革命作的历史比较分析更深刻。

(四)敌我比较法

通过敌我比较,达到了知己知彼,预见了革命的结果,增强了中国人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和投身革命的热情。对马列主义土地革命理论和军事科学理论作出了创新和发展。

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作了比较分析:“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发展中的。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极好。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

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了恢复的形势了,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革命前的生产量。……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也参加了生产工作。”^[1]这一比较,使我们看到了土改后的根据地农业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与此相反,“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鼓励之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1]

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中日状况作了深刻地对比分析。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上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第三,日本战争虽然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国体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3]在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可速胜,又在这方面有其基础。”“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时期。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通过对比分析中日双方的特点,毛泽东得出结论:“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3]并据此再经过深入细致地对比分析,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提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预见了战争的结果,增强了人们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并指出了取得抗战胜利的正确战略和方法。战争的结果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性。

(五)正反比较法

通过这种比较方法,毛泽东制订了对敌斗争的

正确的策略方法和战略战术原则。对马列主义策略思想作出了创新和发展。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各阶级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抗日要求,即使“在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不是不利于革命的,而是有利于革命的。”^[1]同时毛泽东也提醒,“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一问题”。^[1]“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象。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1]在这缜密的正反比较的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在同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过程中,同他们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通过反复的正反比较分析,“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1]从而给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二、毛泽东的比较思维方法 遵循的一般规律

首先要掌握第一手材料。获得材料的途径是调查研究,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对此有二十多万字的著述。他多次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1]调查研究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第二是对获得的材料进行加工处理,分析综合。它的方法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其实也就是比较分析的过程。第三是在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判断,也就是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科学结论。第四,在得出的正确判断的基础上作出行动计划和科学决策。对此,毛泽东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

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1]

三、毛泽东在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中 比较思维方法的特点

(一)在比较时既注意事物的整体性,又注意事物的系统性

除了在总体上把握事物的特点外,还研究事物的多个层次、各个侧面、各个组成部分或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通过综合分析,形成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如上面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双方存在的相互对立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如果仅看到敌强我弱,就会陷入“亡国论”;如果只看到我方优势,则容易导致“速胜论”。毛泽东通过综合分析敌我双方各自特点及其关系,得出结论: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二)在比较时注意同历史科学相联系

毛泽东对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博古论今,交叉运用各种比较方法,以历史材料为基础,立足现在,预测未来。如上述对资产阶级的估计,在大革命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应把它拉到统一战线内,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才予以消灭。

(三)把定量和定性比较分析结合起来

既注意到量的多少,质的不同,又注意到量对质的影响,质在量的影响下的变化。如对无产阶级的分析,虽然工业无产者数量不多,但它代表了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四)恰当地把握了事物的可比性

既注意所比事物对象间的联系,又不忽视双方的区别。如上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对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军阀、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进行了对比分析,比较对象是各个阶级,比较的依据是他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比较的内容是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经过比较分析,分清了敌我友,解决了革命的首要问题。

19世纪以来,比较思维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重

(下转第53页)

理论上,环境保护税的税基有三种:一是以污染排放量为税基;二是以污染企业的产量为税基;三是以生产要素中或消费品中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为税基。但以生产量为税基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生产要素中或消费品中所包含的污染物与污染排放未必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后两种不尽合理。所以目前,只要在技术上能计量污染物的排放量,最优的税基是污染的排放量。采用定额税率,实行从量定额课征。对实际排放量难以确定的,可根据纳税人的设备生产能力及实际产量等相关指标测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为鼓励纳税人积极治理污染,应制定出各种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排放质量标准。对应税包装物,可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入按比例税率课征,也可以按销售数量采用定额税率课征。

理论上,环境保护税的负担应等于所造成的边际环境损害。但实践中为保证征收效果,就“三废”的排放行为而言,应高于现行排污费的收费标准。但税率不宜过高,否则抑制生产。在设计税率时必须认真研究测算。对污染排放实行在最低量之上的差别税率。未超过标准的,允许免税排放。对超过标准的,则应根据其不同类别设置税目,视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对同一类污染物,也有必要根据其有害成分的不同含量,确定相应的税率。

4. 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及相关问题

环境保护税是一种专门性目的税,其税收收入应当作为专用基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制度,全部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开支。根据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情况,环境保护税应作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系统负责征收管理,并按照属地原则划分税收管辖权。

(二)在建立税制方面,要改革现行税种

1. 扩大资源税课税范围

具有重大生态环境价值的水、河流、湖泊、草原、森林、动植物、地热资源等缺乏税收调控,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应着手进行准备工作,条件成熟时

择机将这些资源逐步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2. 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

对过度耗费自然资源的消费品(可能不是奢侈品)如:一次性卫生方便筷等,以及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的消费品课以重税^[5]。

3. 改革营业税

对木材、药材、稀缺动植物等容易破坏生态环境、引起环境污染的产业规定较高税率;同时,降低那些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消费自然资源较低的产业的税率。

4. 减、免税政策

应通过所得税对资源再利用给予充分的鼓励,即对资源再利用的产品和产业给予减税或免税政策,例如对废水、废气、废渣及垃圾的再处理、再利用等给予鼓励或嘉奖,使其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对那些改进技术和工艺,改善环境所发生的费用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不仅可以让其在所得税前扣除,而且可以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加以扣除,以体现对资源充分利用的奖励和补偿。

5. 农业税的减免政策

在农业税方面,对改良土壤、提高农家肥使用比例、增加地力、扩大耕地面积、植树造林等有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给予减免税。

参考文献:

- [1] A. 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M]. London: Macmillan, 1932.
- [2] 李文浩, 卢贤光. 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可行性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1998, (5): 58.
- [3] 王景文, 许文昊, 灼亮. 论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构建[J]. 税务与经济, 2000, (1): 19.
- [4] 计金标. 生态税收论[M]. 北京: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3.
- [5] 毛夏鸾. 试论建立环境保护税制的理论依据和政策目标[J]. 中国财政信息资料, 2000, (19): 41.

[责任编辑 陈志和]

(上接第25页)

大影响越来越明显了,它在自然科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和发展,促进了一些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如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政治学、比较哲学、比较现代化等方兴未艾。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比较思维艺术的规律和特点,不仅有助于思维科学的发展,而且

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 列宁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杨彬智]